

茹費理的殖民思想及其對華政策

(1880-1885)

陳 三 井

- 一、引言
- 二、茹費理的家世、教育及生平略歷
- 三、茹費理的殖民思想
- 四、茹費理的對華政策
- 五、議會與輿論的反響
- 六、結語

一、引 言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法國地理學家、經濟學家、大學教授以及傳教士所鼓吹宣揚的對外殖民擴張思想^①，只有在政治家拳拳服膺，把理論付諸實際行動之後，始能對一般羣眾產生激盪，對廣大社會發生實質的影響。而法國秉政者將此一理論變成實際行動，並產生極大反響者，乃是曾在公元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五年間兩次擔任內閣總理，並一度兼長外交部的茹費理（Jules Ferry）其人。

談近代法國的對外殖民，茹費理確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據法國殖民史家的論斷，他在殖民事業上的建樹，可與英國政治家狄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比利時國王利奧波二世（Leopold II, 1835-1909）、義大利首相克里斯比（Francesco Crispi, 1819-1901）等人相提並論，先後輝映^②。

在探討茹費理個人的殖民思想及其內閣的對華政策之前，先就費理個人的家

① 請參閱拙文：十九世紀法國的殖民主張——近代中法關係研究之一，師大歷史學報，第7期，頁525-533。

② Jean Ganiage, *L'Expansion Coloniale et les Rivalites Internationale de 1871 à 1914*, (Les Cours de Sorbonne, Centre de Documentation Universitaire, 5, Place de la Sorbonne, Paris V.) Vcl. 1, pp. 30-55.

世、所受教育、從政經歷作一概述，藉以明瞭環境是否對歷史人物構成影響？其影響幅度又若何？似乎是有必要的。

二、茹費理的家世、教育及生平略歷

公元一八三二年四月五日茹費理出生於法國東部的臥茲 (Vosges) 省聖帝業 (Saint-Dié) 市，家道小康。父親查理·愛德華·費理 (Charles-Edouard Ferry) 業律師，母親則是伍繼耶 (Vauziers) 鎮地方法庭庭長的獨生女，稱得上法律世家。費理在就讀聖帝業中學時，就是一個成績優異，表現傑出的學生，「他的聰明好學與果敢堅毅，乃同學心目中的楷模」^③。一八四六年秋天，當其母親過世後十年，費理全家由聖帝業市遷居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並於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動盪之際，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中學學業。

通過中學畢業會考之後，費理立即著手準備法學的研究。在這段時間，費理首先閱讀當時巴黎大報之一的「世紀報」(Le Siecle)^④，與同學討論政治，並熱切關心時局的發展。一八五〇年夏天，費理因為不上教堂做禮拜，受到姊姊的嚴厲指責，遂跟隨父親定居巴黎，繼續他的學業。這位年輕的未來律師，除了定時到巴黎大學法學院上課外，比從前更對政治有興趣，也經常跋涉於學校與波旁宮 (Palais-Bourbon，眾議院所在地) 之間，為的是聆聽當時名國會議員德布茲 (Michel de Bourges) 或貝利葉 (Berryer) 的演說，事後並將國會與麗榭宮 (指內閣) 之間的一切公開辯論紀錄全部飽覽無遺^⑤。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路易·拿破崙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所一手導演的政變^⑥，予茹費理極大的感觸。不久，學業結束，費理向巴黎律師公會註冊，由此開始了他的律師生涯。一八五四年，他出任律師年會的秘書。在開幕典禮上，以「論哲學思想對十八世紀律師職務的影響」(De l'influence des idées philosophiques sur le barreau de dix-huitième siècle) 為題，發表專題演講，博得一

^③ Maurice Reclus, *Julus Ferry, 1832-1893* (Paris, Flammarion, 1947), p. 13.

^④ 「世紀報」(Le Siecle)，係民主派的喉舌報，一八三六年七月為杜塔克 (Armand Dutacq) 所創刊，其後，訂戶迅速增加，成為當時巴黎大報之一。參閱 Charles Ledre, *Histoire de La Presse*, (Paris, Fayard, 1958), pp.216-17.

^⑤ Maurice Reclus, p.16.

^⑥ 路易·拿破崙雖然當選為第二共和的總統，但時時以修改憲法中有關總統任期的規定為念，由於運用議會合法的手段不能達到目的，他只好採取激烈的行動，宣佈解散立法會議，占領議場，逮捕了重要的議員 (包括王黨與共和派)。參閱王曾才，*西洋近世史* (國立編譯館出版)，頁 530。

致好評，從此被視為「立法會議」(Corps Législatif)的候補人選之一^⑦。一八五六年當其父親逝世後，他們在馬薩林街(rue Mazarine)的故居，遂成為年輕共和黨人的俱樂部，其中大部份為律師。這也是反對第二帝國者的避難所。

一八六五年年底，費理進入法國當時最負盛譽的「時報」(Le Temps)工作，定期撰寫有關政治方面的專欄。此外，他又與有激進傾向的「論壇報」(La Tribune)以及查拉梅拉庫(Challemel-Lacour)、布里松(Brisson)等人所辦的「政治評論」(Revue Politique)合作，激烈抨擊當時的帝政，這些活動引導他走向政壇，也奠定他日從政的基礎。一八六八年九月，他因律師事務(為保護一位客戶利益)而到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一行，在此不期而與當時以反對第二帝國著名的共和人物甘貝達(Gambetta)邂逅，從此這兩位政治人物即「心連心」的結合起來，其後無論在政壇上或選舉活動上，兩人皆搭檔合作，愉快無間。

自君士坦丁堡回國後，為他在議會裏爭得一席之地的好時機已經到臨。一八六九年，當他獲選進入「立法會議」之際，費理時年不過三十七歲。第二帝國瓦解後，他出任甘貝達所領導的國防政府的秘書，負責德軍圍城期間的糧食供應工作；雖多著勞績，但由於所採取的分配方法不當，使他極不得人望，一般百姓諷稱壞麵包為「費理麵包」(Le Pain Ferry)，以示對他的責難。

在巴黎圍城期間的歷練既不得意，費理乃返回故鄉，投身競選，卒於一八七一年二月八日當選為臥茲省的眾議員。一八七二年三月十二日，奉派出使雅典，擔任法國駐希臘的全權公使，以保衛法國在近東方面的利益；但隨著蒂葉(Thiers)政府的垮台，他不久也被解職。雅典的出使，羅馬的短暫停留，都使他獲得一種深刻印象，認為法國的聲望幾乎在歐洲有如旭日東昇，所以他在報告中特別提到，深以國內一羣保守人士與教皇至上論者的瘋狂行為為憂，因為這些均未能對法國的聲望提供有效的幫助與可貴的同情。大致而言，費理一切未來的擴張政策，就在這種憂慮中萌芽生根^⑧。

一八七三年五月，費理回到巴黎執行議員的職務，積極參予國會中的辯論工作，側身反動的多數派。一八七七年，費理當選連任，並被瓦丁敦(Waddington)內閣延攬，於一八七九年二月四日出任公共教育(Instruction Publique)部長。一八八〇年費理第一次受命組閣，仍自兼公共教育部長，而界外交部長予桑迪里

^⑦ Alfred Rambaud, Jules Ferry (Paris, Plon-Nourrit, 1903), p. 3.

^⑧ Maurice Reclus, p. 100.

(Barthelemy Saint-Hilaire)。在第一次擔任閣揆期間（自一八八〇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十日），費理有突尼斯之遠征。費理於一八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第二次組閣，仍自掌公共教育部，而以查拉梅拉庫為外長，九個月後，查氏因意見不合，遂以健康理由辭官不幹，費理乃自兼外長，而將公共教育與美術部長一職交弗意葉 (Fallières) 負責。

茹費理，這位有「法國第三共和的三大締造者」之譽的法國人，是一位性格專橫，意志百折不撓的政治家。他的外甥女——皮桑妮·費理 (Mme Pisani-Ferry) 在一本書中對他有這樣的描繪：「一位偉大的中產階級，一位健碩的臥茲省人。有人說，他外表粗獷、冷漠，有如家鄉的花崗岩；骨子裏，他是個溫柔者，不過柔性只表現在家庭中，只對家人有笑容。對外在的毀謗、不得人望與偶發事件等無動於衷，仍像山地人一般邁著均勻而沈重的步伐前進。是一個外表不具吸引力的人，但對於這個甫告誕生，而不能聽其自生自滅，希望有一番作為的共和國，卻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人」^⑨。

三、茹費理的殖民思想

無論後世史家對茹費理其人如何描繪，綜其一生，他的名字與第三共和的教育與內政均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這並非本文的研究範圍，我們最感興趣的乃是他一生事業中的最後階段，也即有關對外殖民的部份。

首先，我們來研究費理的殖民思想。

當我們研究一位政治人物的事功時，不禁要問，他在從事這件工作時，是否早已有一種「成竹在胸」的先見引導激勵著他？根據文獻記載，費理在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似乎與殖民問題扯不上任何關聯。更明白言之，他在一八八一年突尼斯之役前，素與海外事務沒有發生任何接觸。既然如此，如何解釋後來的發展或轉變呢？阿爾島 (Martin Aldao) 認為，這毋寧是事件逐步發展，漸漸引導他走向這一事業^⑩。波蒂謝 (Maurice Pottecher) 分析得更透澈，他這樣說：「這是環境一步步決定他從事這個最初覺得有點膽怯的征服；其後因事件的發展而逐步擴大。在他身上，就像在其他偉大藝術家一樣，理論與實際是同時編織而成的；計劃、實施方法均隨事功的逐步建立而漸趨成熟確定。當行動成型，思想觀念亦跟著明朗化」^⑪。

^⑨ Mme Pisani-Ferry, Jules Ferry et Le Partage du Monde (Paris, Grasset, 1962), p. 2.

^⑩ Martin Aldao, Les idées Coloniales de Jules Ferry, These de Droit, Paris, 1933.

^⑪ Maurice Pottecher, Jules Ferry (Paris, Gallimard, 1930), p. 184.

皮桑妮·費理亦持相同的看法，她認為「隨著法國海外事業的逐步建立，茹費理的殖民思想乃次第孕育成熟」^⑫。

綜合前述史家的說法，並非完全為費理洗刷辯護。吾人大致可以肯定，環境對於他確有重大的影響，由於人與事的雙重激勵，茹費理始逐步醞釀成熟他的殖民思想。

其次，我們要更進一步探究，茹費理的思想從何而來？受到何人的影響？無疑的，當時英法兩國的殖民鼓吹者，如英國哲學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法國經濟學者列霍華·伯利俄（Paul-Leroy-Beaulieu）曾特別引起費理的注意。據朱里安（Ch. André Julien）的研究，費理受到當時英國文學，尤其是牛津大學教授席勒（Seeley）所著「英國的擴張」（The Expansion of England）一書的影響最大^⑬。席勒的書出版於一八八三年，一八八五年有法文譯本；該書對於英法兩國的殖民政策作了相當有趣的比較，費理從書中借用了不少例子作為自己思想體系的註腳。

有「近代法國殖民擴張使徒」之稱的茹費理，吾人若欲分析其殖民思想，可從兩篇文獻中求之。其一為一八八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茹費理卸任內閣總理後在眾議院的一次長篇演說；其二為一八九〇年，他為「北圻與祖國」（Le Tonkin et la Mere-patrie）一書作序^⑭，題為「五年之後」，共達五十五頁之多。

論茹費理的殖民思想，正如其他大多數的法國殖民主義者一般，無可否認的，首先有一層虛榮心的動機。他認為法國不該「沉緬於對流血不止的傷口的沉思」，不能永遠想著阿爾薩斯·洛林的問題，而應該從「臥茲山翠綠的邊界」（Ligne bleue des Vosges）轉移目標到別處。

因此，法國應該重振聲威，試圖恢復她在世界上的地位。七月二十八日，費理對議會這樣說：

「僅放射光芒而不採取行動，不介入國際事務，對歐洲各式各樣的組合變化袖手旁觀，視對非洲或東方的一切擴展為一種陷阱，一種探險，這樣的生活方式，對於一個大國而言，無寧是自暴自棄！而且，在你無法相信的短短期間，這個國家就會從第一等強國，一降而為三等或四等國家」^⑮。

^⑫ Mme Pisani-Ferry, p. 5.

^⑬ Ch. André Julien, Jules Ferry (in "Les Politiques d'expansion imperialiste" Paris, P. U. F. 1949), p. 70.

^⑭ 編者為 Leon Sentupery, 1890年 Victor-Harard 書店出版。

^⑮ 1885年7月28日茹費理在國會演講詞。

省政府發出電報³⁸。

二月二十八日晨，四百多名勤工儉學生在巴黎示威遊行，並推派蔡和森、向警予、趙世炎、王若飛等十人代表晉見公使陳籙請願，要求解決工作、求學、發放救濟金等問題。陳籙謂使館無權應允，遂與留歐學生監督高魯及巴黎副領事李駿親赴使館附近之花園，向等候之學生說明，雙方爭持再三，不能解決問題，公使身陷重圍，最後引起法警干涉，卒以暴力驅散同學，代表在使館者久坐不去，至晚由法警挾之出，結果有數人受傷³⁹，廣東學生王木因跳電車跌倒，為車輾斃，肝腸斷裂，死狀極慘⁴⁰，屍體為法警拾去，次日，勤工儉學同人路經其地，見血堆中有殘肝兩片，特拾起貯酒精瓶中，以為請願之紀念⁴¹。

「二八事件」的主要領導人是新民學會的一羣，如蔡和森、向警予、李維漢等人。周恩來留法較晚，又二月中旬始從倫敦回到法國，在巴黎近郊的哥倫布（La Garenne-Colombes）居住，一面到市區阿里昂絲法語補習學校學法文，一面以記者身份繼續為天津「益世報」撰寫通訊⁴²。故前面學生代表自一月起與使館間的種種交涉，他均未及參加。但他可能趕上了二月二十七日在巴黎一家咖啡館所召開的勤工儉學生代表大會⁴³，這次大會決定了第二天向公使館的羣眾請願。總之，周雖不是這次使館請願風潮的主角，但他關心勤工生的前途，始終注意整個事件的發展，則不待言。事後，他曾撰寫一篇長達兩萬多字的通訊——「留法勤工儉學生之大波瀾」，在「益世報」發表，詳細報導事件的來龍去脈，是同類報導中最完整詳盡，並具議論分析性者。使館請願風潮，可以說是周恩來介入勤工儉學運動的先聲。

乙、拒款運動

民國十年六月，北洋政府特派專使朱啟鈐、財政次長吳鼎昌到巴黎，據巴黎學界瞭解，表面上是代表總統徐世昌接受巴黎大學的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而真正的使命是向法國借款三到五億法郎，名義是救災，其實是購買軍火等用途⁴⁴。借款條件

³⁸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參閱「五四運動回憶錄」（北京，一九七九）上册，頁一一六。

³⁹ 有關「二八事件」經過，各方因立場不同，說法不一。茲綜合李維漢、周恩來、盛成、天一等人說法，作一較客觀之敘述。

⁴⁰ 旅歐週刊，第六十九期，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二日，頁三。

⁴¹ 晨報，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清華大學編，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北京，一九八〇），二册上，頁四三〇。

⁴²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四九。

⁴³ 另一說，周恩來在「二八運動」時不在法國，他是事件發生之後才從英國返回巴黎。參閱戴緒恭，向警予傳（北京，一九八一），頁六八。

⁴⁴ 據朱啟鈐事後應時報訪問表示，吳鼎昌受王克敏之囑，赴法接洽。當時中法實業銀行，基礎動搖，法國方面希望中國政府發行三萬五千萬佛郎之國庫券為之維持，並允由中法實業銀行，供給借款五千萬佛郎於中政府，以為交換條件。參閱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二册下，頁五一五。

以全國印花稅、驗契稅作抵押，以滇渝鐵路建築權、全國實業購料權作交換。消息傳出後，旅法學生與僑胞莫不義憤填膺，華工會、中國留法學生聯合會、國際和平促進會、亞東問題研究會、巴黎通信社、旅歐周刊社等六團體遂成立「拒款委員會」，從事拒款的各項努力。拒款運動於六月二十二日展開，其時所進行之方法大略如下：

1. 通電國內，電文如次：

「申報轉各報館各團體鑒：朱啟鈞、吳鼎昌在法秘密借款三萬萬佛郎，條件嚴酷，旅法工商學界一致反對，望國人極力抗爭。旅法各界六千餘人同叩。」

2. 散布傳單，內容大都為報告每日間所進行之事實及拒款之情形。散布地點除巴黎外，且向在法之各地學校、工場及商店之僑胞投遞。

3. 以法文宣言送達法國國會議員、國務員、各報館及各重要人物，約一千餘份。「拒款委員會」所辦之事，以此項最為得力，巴黎報紙除登載全文外，且有附以評語者。

4. 致函詰陳錄公使，內容有「先生負外交重責，代表國家，宜有所表示」之要求。陳氏復函謂，此事出於誤會，請派代表至公使館面談，解釋一切。

5. 發通告致國內各團體及美洲、南洋華僑、留英留德學生會，勸其一致力爭。

6. 致函質問吳鼎昌，其函如下：

「知公在巴黎又密謀借款，希圖賣國，今請明告公，公如自愛，可速將此事打消，並即離歐，否則上天入地，必有人與公相見。」^④

「拒款委員會」先後於六月三十日及八月十三日在巴黎哲人廳(Société Savante)召開兩次「拒款大會」，通過「拒款宣言」，宣讀周恩來所起草的借款真相的調查報告。在八月十三日的拒款大會中，陳錄公使不敢來，而派一等秘書王曾思代表解釋，力言借款簽字之說，實屬毫無根據，公使館始終未與聞其事，且法報之登載亦未嘗見。言時頗怒形於色，似怪同胞開會為多事，又時復以拳擊案，表示其不滿，致遭滿腔義憤之羣眾毆打。迨會場平靜後，張君勳起而質問，並提出兩條辦法，請眾討論：(一)應請公使即向法政府聲明，反對此次借款，並向法國各報要求更正，並無簽字草約之事，若借款仍然成立，公使及全館職員均應辭職，以謝國人；(二)以後凡關於中法借款之事，應交由留法各界所組織之外交委員會審議，得其同意，方能執行。是議提出後，經與會人多數通過，王秘書亦鼓掌贊成，當即照原議繕寫兩

^④ 旅歐週刊，第九十一期，借款專號，頁一；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北京，一九七九），頁八〇～八一。

馬達加斯卡」^⑳。

一八八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茹費理登上議壇，為遠征馬達加斯卡的軍費而大聲疾呼，一方面闡明他的殖民思想體系，一方面為他的殖民政策究竟是隨意而動，或為擴張的唯一樂趣而辯護。據史家朱里安認為費理的這次報告，乃在議壇公然發表的第一次帝國主義宣言^㉑。

總而言之，法蘭西的虛榮與偉大，商業與財政方面的利益，英法的角逐競爭，東方日漸增濃的吸引力，慈善性的人道之憂等，凡此都構成茹費理孕育殖民政策的主要動機。

四、茹費理的對華政策

在茹費理主政期間所從事的所有殖民事業，以越南事件最稱重要，因其耗時最久，費力最鉅。

法國史家藍波（Alfred Rambaud）曾任公共教育部主事，在其所著茹費理傳（Jules Ferry）一書中論及安南問題時，有以下一段發人深省的話，他說：

「在茹費理的所有殖民事業當中，此事所遭遇的困難最大，因其在僻遠地區進行，又冒可能挑起國際爭端之險；代價最昂，所喪失的眾多生命與數百萬經費，並非過甚之詞；耗時最長，最富有驚奇性，予主事者的人緣以最致命的打擊；但也可能是收穫最豐碩的，由於法國的介入北圻，結果乃得擴展勢力於安南，而席捲了印支半島的大半」^㉒。

在探討茹費理內閣的對華政策或整個遠東殖民政策之前，吾人首先應分析法國對外殖民擴張時的主要外交顧慮所在。

「歐洲控制世界，而俾斯麥又控制歐洲」^㉓，這是當時法國茹費理內閣所面臨的國際情勢。普奧、普法兩次戰役，使德國一躍而為歐陸第一等強國，其首相俾斯麥亦成為外交界無法匹敵的主宰者。至於海外殖民的角逐，仍以英國執世界之牛耳。因此，法國若欲向外擴張，首先將遭遇英國的頑強競爭；若想實行大陸政策，則勢必與德國發生嚴重之衝突。

自普法戰後，德國因恐法國尋仇報復，故俾斯麥竭盡心機以轉移法國的目標，

^⑳ 同註^⑮。

^㉑ Ch. Andre Julien, Jules Ferry, p. 70.

^㉒ A. Rambaud, Jules Ferry, p. 324.

^㉓ Pisani-Ferry, Jules Ferry et le Partage du Monde, p. 9.

使其視線不停留在「臥茲山翠綠的邊界」(Ligne bleue des Vosges)上。早在一八八〇年四月八日，俾斯麥致德國駐巴黎大使荷漢洛親王(Prince de Hohenlohe)的訓令上即說：

「只要法國放棄征服德國，我們便可以對她表示善意。……如果法國認為，擴大其政治運作基地是其利益所在，她不僅可以信賴我們的持重態度，同時在某種情況下，也可以得到我們的支援，只要我們在德國的地位，我們獨立自主的地位沒有遭到威脅的危險」^①。

另一方面，法國駐柏林大使聖華蓮(de Saint-Vallier)於一八八〇年六月六日也接到俾斯麥相同的保證。俾斯麥對他說：「只要法國不把視線轉移到她古老的阿爾薩斯、洛林兩省，我隨時準備支持援助法國的政策行動。我把幫助法國在我們不致引起衝突的遙遠地區尋求補償，獲得利益，看做是一種義務。特別是在非洲南部，我認為這些地區已然置於法國的正統勢力範圍下」^②。

當一八八三年，茹費理再度組閣時，德國方面所表現的這種友善態度更趨明顯。一八八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法國駐柏林大使顧賽爾(M. de Courcel)向外長查拉梅拉庫(Challemeil-Lacour)報告說：「當我向哈茲費爾德伯爵(Comte de Hatzfeld，德國主管外交事務的國務大臣)宣稱您新掌外部時，他對於您在法國議會發表新閣就職演說所透露的和平口吻表示滿意。他還告訴我，荷漢洛親王已經把對內閣總理和你有關外交政策聲明的好評轉達。最後，他向我保證，德國皇家政府願意向法國共和政府證明一切的善意和友善」^③。

法國政壇耆宿瓦丁敦(Waddington)，以參議員、前任閣揆暨外長身份，被任命為全權特使前往莫斯科參加俄皇亞歷山大的加冕典禮。歸途路經柏林，於一八八三年五月十三日與俾斯麥首相曾有過一次面談，後者如此對他表示：

「我對法國的感情沒有改變；我在五年前對您說的話，今天還可以重複一遍。我們既沒有戰爭的任何野心，也沒有擴張的意圖。在這方面，我們已經心滿意足。將來要逼我們打仗，除非你們先對我們開火。我個人曾經反對佔領阿爾薩斯，但軍方的影響力後來佔了上風；現在木已成舟，事實很難改變。至於其他任何地區，我們可以彼此諒解、商定，甚至我們可以在彼此利益不相衝突

① Politique exterieure de L'Allemagne, T. III. n° 538, 引自 Pisani-Ferry, p. 51.

② 同前註, p. 52.。

③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cais, Tome V. N°2.

的許多方面，向你們提供協助」^④。

顯然的，俾斯麥爲了轉移法國的目標，不惜降尊紆貴，試圖與法國親近。這位睥睨羣雄的風雲人物，不僅一再表示對法國的好感，而且頻頻向法國政治家投送秋波。他曾經對法國駐柏林大使顧賽爾這樣說：「我個人不認識費理先生；但請轉告他，我對他的一番善意是真摯的，我對他的行動方針不會改變；我希望他對我的態度也不會改變！」^⑤

俾斯麥並不以甜言蜜語博得法國的好感爲已足，他還進一步有所行動，以有利於法國的實際行動來討好法國。當法將李維業 (Commandant Rivière) 在北圻陣亡的消息傳抵德國時，俾斯麥爲了表示德國的親善誠意，以及對法國的支持，特下令阻止中國政府向德國軍火商人所訂購的海軍驅逐艦的出發^⑥。

其後，中法戰雲密布，戰端一觸即發，據荷漢洛親王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記所載，俾斯麥曾委託他在巴黎公開宣稱，「德國對法國的政策始終一貫，沒有任何因素可以讓我們不採中立；法國可以自由行動，無論在海上或陸地均可放手一戰」^⑦。

由前述可知，在中法越南衝突期間，俾斯麥不僅在外交上採取慎重的措施，以免招惹法國政府的不快，甚且在態度上極其鼓勵法國在北圻的行動。事實上，正像茹費里自己毫不掩飾的承認：「俾斯麥很技巧地把我們推向北圻和馬達加斯卡的遠征；這是一位前任大使所可肯定的」^⑧。這位前任大使即是法國駐柏林大使顧賽爾，他在俾斯麥與茹費理之間扮演中間人 (intermediaire) 的角色，地位極其重要。在北圻事件結束後五年，即一八九〇年，茹費理更坦白地作這樣的見證：

「德國無論在北圻、在中國海、在臺灣、在馬達加斯卡，均未以任何藉口阻礙或限制法國的軍事行動，這是完全正確的。這期間的殖民政策，法國最不必顧慮他在歐陸的安全，這也是千真萬確的。自然，有許多人說，俾斯麥最高興看到我們陷入僵局。……當我們想從北京政府的最後反抗下取得勝利，不得不乞靈於食米的封鎖時……，第一個附和我們主張的是俾斯麥」^⑨。

如果說法國在殖民方面獲得了德國的大力支持（精神上或行動方面），但卻在

^④ Ibid, N°35 Waddington 致 Challemel-Lacour, 柏林, 1883 年 5 月 14 日。

^⑤ Ibid, N°170. Courcel 致 Ferry 私函, 1883 年 12 月 16 日。

^⑥ Ibid, N°42. Courcel 致 Challemel-Lacour, 1883 年 5 月 19 日。

^⑦ Prince de Hohenlohe Schillinsfurst, Memoires, T. II, p. 123

^⑧ Jules Ferry, Le Tonkin et La Mere-Patrie, p. 31.

^⑨ Ibid, p. 32.

另一方面遭到英國極大的阻撓。英國當時以殖民第一強國地位，似乎不願看到法國也成爲一個海軍的、商業的、殖民的強國。因此，從一八七四年到一八八五年期間，無論在印支半島、在馬達加斯加、或在埃及，法國勢必處處面對英國強而有力的挑釁。

英國的輿論界對法國的海外擴張，與政界同樣充滿敵視的語調。一八八三年四月十五日，法駐英大使狄索(Tissot)在其致外長查拉梅拉庫的報告中，有如下一段細微而深入的分析：

「目前英國在遠東這一地區的利益等於零，既無法激起英國本身的利益，英國報紙在表面上不發表反對我們擴張的計劃。……但當事涉贊同時，語意含糊，憤恨之情即暴露無遺。她對我們的計劃可以贊同，但有一特別條件，那即是我們的行動必須果斷而富決定性。然則，英國報紙絕對懷疑這個條件可以履行完成。猶豫、延宕、衰退，這是長久以來我們外交政策的特徵，此一特徵令英國報紙擔心我們只能採取不澈底的手段，而不澈底的手段將導致全面失敗。基於這種友誼性的先見之明，英國報紙善意的建議我們，最好不要從事一件超越我們力量或毅力的殖民事業」。

「至於這個國家的政壇人物所持的論調並無二致，他們對於現在我們所進行的種種計劃瞭解更爲透澈。英國內閣中一位最具影響力的閣員明白暗示說，英國對於我們的行動勢必與中國發生一場嚴重的戰爭，而且以目前狀況而論，其結局將是法軍的全面失敗，不能不感到不安。甚且，此一失敗對於英國之在印度以及俄國邊界必有其反響，因而法國面對倫敦與聖彼得堡政府，勢難推卸令人惱火的責任問題」^④。

英國政府對印支半島的態度，令法國難堪，並構成威脅。特別當法國於北圻進行一項「戰而不宣」的戰爭時，英國首先宣佈中立。事實上，英國此舉無異宣示中國與法國雙方正處於戰爭狀態中，而將中立港口關閉，不准法艦使用。當法國政府決定對臺灣實行米的封鎖時，英國立即抗議。由上述一連串行動而論，我們不便公然指出英國處處與法國作對，但至少可以斷言，法國在遠東的擴張政策，與英國利益相衝突，故不爲英國所歡迎，此與俾斯麥的友善態度恰成一鮮明對比。當然，這是德英兩國此時基本外交政策的不同，而非主其事者在感情上對中國有所嫌惡或偏愛。

^④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Tome V. N°21.

由於在北圻的軍事行動進展並不順利，法國不得不另謀增兵遣將支援。一八八三年四月九日，茹費理內閣乘國會復會之際，提出一筆五百三十萬法郎的撥款請求，做為海軍部在北圻軍事用途的專款。這個增兵所需的專款先於五月十五日經眾議院表決通過，復於二十四日獲參議院同意贊成。五月二十六日，一封來自西貢的電報透露法國在北圻軍事失利與統帥李維業陣亡的消息。李維業的陣亡在法國引起極大的反響，政府在悲悼之餘，立即致電西貢當局，表示復仇之意，語氣堅決而肯定，其電文如下：「國會已一致投票通過北圻軍費專款，法國將為她的光榮子孫雪耻復仇！」^④這封充滿窮兵黷武思想的電文，沒有收在北圻事件結束後即印行的「黃皮書」(Livres Jaunes)內，也未在稍後出版的「法國外交文書」(Document Diplomatique Français)中發現，倒是兩位軍人出身的作者在其書中很自然的把它引用。以當時法國輿情的激昂，這封電文的存在是可信其有的。

李維業的死，對於熱衷法蘭西光榮偉大的法國人而言，自是一項很大的打擊，同時也領受到「退卻政策」的教訓。因此，法國政府立刻採取果斷措施，以前駐曼谷領事哈爾芒醫生 (docteur Harmand) 為民政長官 (Commissaire Général Civil) 布義葉將軍 (Général Bouët) 為交趾軍區司令，指揮北圻軍隊；孤拔少將 (Contre amiral Courbet) 出任新置的北圻海軍分區司令。

民政長官的設立，在法國的北圻殖民政策上是一項創舉。其任務如此規定：「民政長官代表政府旨意，駐紮前線軍事當局，負責監督，不使軍事行動超越政府訓令。民政長官本身即為交涉大員，同時也是行政官與組織專才；他將運用本身所能支配的一切方法，防患中國的干預，重新拉攏安南政府，並切斷順化與北京之間既存的聯繫，最後如有可能，爭取為安南政府所雇用的黑旗軍」^⑤。

民政長官的設置，顯然隱含有以政監軍的味道。經過安鄴 (Francis Garnier) 與李維業兩次軍人蠻幹作風事件後，法國吸取教訓，不得不另設代表政府的高級文官，就近監督，以防英雄式悲劇的重演！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安鄴與李維業均喪身於黑旗軍之手，法國軍隊提起黑旗軍，不無戒慎恐懼之心，法國政府也認為黑旗軍乃其殖民安南的一大障礙，故不惜運用一切手段以為對付，如能收為己用，更屬上策。

研究法國的對華政策或安南政策，由於直接史料得來不易，一般甚難下手。一八八三年七月十日，由於李維業的意外陣亡，在法國國會中引發一次關於茹費理內

^④ Boninai et Paulus, L'Indochin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Tome II. p. 121.

^⑤ Livre Jaune, L'Affaire du Tonkin, 2^{ème} Partie, p. 122.

閣殖民政策的大辯論。從這次國會議員的質詢和主其事者的答辯，可以幫助我們對於法國的遠東殖民政策，乃至對中國的態度，有一輪廓性的瞭解。這場辯論由國會議員葛蘭奈（Felix Granet）與德拉霍斯（Jules Delafosse）的質詢所引發，代表政府答辯的是外交部長查拉梅拉庫（Challemel-Lacour）。根據外長的答辯，我們可以多少獲悉法國對於北圻、安南與中國的一個明確立場。

就北圻而言，法國的目的在於「穩固而堅牢的建立據點於紅河三角洲」。法國政府給哈爾芒民政長官的訓令中如此說：「我們擬議佔領北圻的唯一部份是紅河三角洲；我們不超越毗鄰明江支流的北寧與興化，除非沿海據點呈現有佔領的必要」^{④③}。

至於北圻的其他部份，法國政府的目標，在於「肅清北圻的盜匪，重建該地的秩序與安全」；外長認為這是一件長程的工作，一旦秩序重建，組織重整時，那是政府當局責無旁貸的工作，也正因為了建立這種權威與鞏固這項權威，才引導法國走向北圻^{④④}。

對安南，法國政府並不構思征服的計劃。其唯一的目的僅在促使安南承認一八七四年條約所載的保護權，並確保法國佔領紅河三角洲新條件下利權的履行。關於這一部份，法國政府給民政長官的訓令中有如下一段說明：

「我們對安南帝國沒有領土的野心。既不想鯨吞，也無意蠶食，我們隨時準備向順德王（Roi Tu-Duc）保證其國家的完整。一八七四年的條約帶給我們在北圻某些利權，同時也課責我們以若干義務。由於安南方面的一再違約，使我們無法履行條約，不得不於紅河三角洲建立據點，以執行暨保衛我們的利權。從我們侷限於佔領三角洲若干必要的據點這一事實，明白顯示我們並無意併吞安南」^{④⑤}。

關於法國在遠東的政策，查拉梅拉庫外長繼續說明，法國的目的，「在使已訂的條約獲得履行；鞏固並加強與這些國家的商務關係，特別是與日本政府友善關係的持續；保持與暹羅王與暹羅國的最融洽關係」。查外長指出，「法國與這些國家均有條約關係，法國只要求繼續維持或改善雙方的關係，而不要他們的自主權，宗教信仰權或風俗習慣的改變。法國樂意看到這些國家的工商業發達，欣欣向榮，如

④③ Ibid, p. 123.

④④ 1883年7月10日，衆議院辯論紀錄。

④⑤ 同上。

至五月底始籌備就緒^①。

民國十一年六月間，在巴黎西郊的布隆恩（Boulogne）森林召開成立大會，參加者有旅法、德、比等國代表共十八人，周恩來由柏林前往參加。會議決定將團組織定名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通過了章程和工作計劃，並選舉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三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由趙世炎為書記，周恩來為宣傳委員，李維漢為組織委員，會議還決定出版刊物「少年」。討論章程時，周恩來提議加入組織者應當宣誓，有人反對，認為這是宗教色彩。周恩來解釋說，宣誓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帶有政治約束力，譬如袁世凱曾經宣誓忠於民國，但他以後做了皇帝，人民就說他叛誓而討伐他^②。其後又增補王若飛、陳延年、尹寬三人為執行委員^③。陳延年、陳喬年兄弟本來信仰無政府主義，經趙世炎等爭取後也陸續加入該組織^④。少共在性質上是團的組織，而不是黨的組織。

同年十一月下旬，旅歐少共派李維漢攜帶公函歸國，向團中央匯報工作，並聲明「願附屬於國內青年團為其旅歐之部」，經中共中央同意，於是少共於民國十二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於巴黎郊外召開臨時代表大會進行改組。這時旅歐青年團的團員已由原來的三十餘人發展至七十二人。（計旅法五十八人，旅德八人，旅比六人）。出席代表四十二人，會議由趙世炎任主席，任卓宣等四人為記錄。會議決定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將「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改稱「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之部），並將原來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為執行委員會，會上並通過了周恩來起草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章程」，章程第一條明確規定，凡申請入會者必須做到「對於共產主義已有信仰」^⑤。大會並選出周恩來、任卓宣、尹寬、汪澤楷、蕭樸生五人為新的執行委員，劉伯堅、王凌漢、袁子貞三人為候補委員。執行委員會成立後，推選周恩來為書記，尹寬主任「共產主義研究會」事，汪澤楷主任「學生運動委員會」事，蕭樸生主任「華工運動委員會」事，任卓宣主任「出版委員會」事^⑥。至十四年初，該團發展為三百餘人，改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區」，至同年年底，又因團員陸續赴俄或歸國減少到一百餘人，組織便相應地改稱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地方團」^⑦。

^①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頁三六。

^②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六六～六七。

^③ 同註^①。

^④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五四運動回憶錄」，上册，頁一二〇。

^⑤ 「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章程」，收於「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二册下，頁八四九。

^⑥ 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報告第一號，「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二册下，頁八四六～八四七。

^⑦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頁三七～三八。

丙、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

由於少共在性質上不是黨的組織，所以在民國十一年冬，已參加少共的中共黨員另組「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⁷⁸，周恩來為支部負責人之一。支部下設法國、德國、比利時三小組，茲誌其負責人與重要黨員如下：

法國組——負責人為趙世炎；黨員有傅鍾、王若飛、李富春、陳延年、陳喬年、李林、任卓宣、鄧小平、劉伯堅、林蔚、郭隆真、余立業、蕭樸生、袁子貞、馬志遠、陳彭年、何長工、李季達、冉鈞⁷⁹。

德國組——負責人為張申府；黨員有周恩來、朱德、張伯簡、鄭太樸、高語罕、李季、孫炳文、熊雄、章伯鈞、謝壽康、廖煥星⁸⁰。

比利時組——起初負責人為劉伯堅與聶榮臻，後來是江澤民。黨員有熊味根、黃士韜、甘瑞、張貴元、喬丕成、喬丕顯、萬監周、張熙等人⁸¹。

中共旅歐支部在組織上是保密的，對外一切活動，都用旅歐共青團的名義出現，即使對共青團也不完全公開。黨支部和少共機關都設在巴黎十三區意大利廣場附近的戈德弗魯瓦旅館裏。當時黨支部和少共機關是重合的，黨員都參加少共組織活動，少共中具備黨員條件的則不斷轉為中共黨員⁸²。

綜上所述，中共旅歐黨團組織的最早領導人是張申府、趙世炎；民國十二年他們離開後，即交由周恩來負責；民國十三年八月，周回國後，則交由鄧小平、傅鍾、任卓宣等人負責。

周恩來旅歐期間，除促成中共組織的成立和發展外，尚有二事值得一提：（一）他經常奔走於德、比、法之間⁸³，介紹中國學生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幫忙辦理去蘇聯的各項手續，並安排他們的行程。據不完全統計，民國十二年三月，有趙世炎、

⁷⁸ 據張申府（談旅歐黨團組織活動情況）、江澤民（參加留法比勤工儉學的回憶）、施益生（回憶中共旅歐支部的光輝業績，以上均見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十五輯）等人說法，中共旅歐黨組織的名稱為「支部」，各地設小組。李璜（學鈍室回憶錄）、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陳敬堂（中共旅歐總支部之成立）等人則有總部，總支部下設支部之說，恐係與少共組織混淆之誤。

⁷⁹ 名單不完全，主要根據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一文而得。

⁸⁰ 名單不完全，主要根據張申府前述談話而得。

⁸¹ 名單可能與共青團相重，主要根據江澤民的回憶而得。

⁸²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十五輯，頁七一。

⁸³ 周恩來與第三國際間的來往（包括經費問題），乃至中共與法共及胡志明之間的關係，始終曖昧不明，由於資料所限，本文不擬探討。但可參閱 Annie Kriegel, *Aux Origines Françaises du Communisme Chinois*, Preuves, 209-210, aout-sept, 1968.; Nora Wang, *Den Xiaoping: The Years in Franc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2, (Dec, 1982), pp. 698-705.

的條約今天所剩幾何？……」^①

葛蘭奈和他的左派朋友不主張征服，而贊同有限制的佔領。他繼續說：「這個國家（指法國）的真正傳統，不是征服，而是殖民，透過我們同胞的自由努力、和平宣傳與勇敢創舉，在法國國旗的飄揚下，把我們文明的原則帶到國外。我們到北圻所追求的真正利益，是眾所週知的。那是要開闢一條通往中國的道路。這是法國政策不斷努力之所在」^②。

右派的德拉霍斯（Jules Delafosse）要求把寶海（Bourée）的「條約」交由眾議院審查，特別堅持先與中國和解的必要。他說：「有人把寶海撤換而代之以德理固（Tricou），而外長告訴我們談判繼續。無疑的談判會繼續，因為雙方還沒有公開決裂。……請注意中國公然或潛在的敵對，因為我們在北圻殖民地的安全，絕對仰仗與她之間的關係。如果這種關係良好，法國的保護權將是一個能致豐收的事業；假使關係惡劣，那麼你們所將從事的工作，只會帶給我們以無限的犧牲與無盡的痛苦！」^③

面對上述的質詢，查拉梅拉庫外長答覆時指出，法國的行動將侷限於紅河三角洲的保有，不從事安南的征服，只求中國尊重北圻的邊界。最後他結論說：

「我們與中國之間並無任何問題；在談判之前，我們沒有與中國商議的任何必要。照我們的看法，我們的代理在十一月與中國的談判是不合時宜的。我們將繼續從事在北圻的事業，我們將在我們的腳下建立起據點；我們知道尋求掩護，不讓一切邪惡企圖得逞。這一步完成，中國政府對我們所提的合適、合理與光榮的安排，經過愛多長時間，即多長時間的考慮之後，將會嚴肅的與我們討論其中的條件，她將發現我們，如同今日一樣，沒有絲毫不耐或怒火。屆時，我們將不拒絕尋求可以保證所有利權之實施及做為和平關係堅實基礎的東西。」^④

一八八三年十月三十日，眾議院以克雷孟梭為首，加上葛蘭奈與喬治貝蘭（George Perin），再度向茹費理內閣的北圻政策施予猛烈的抨擊。克雷孟梭認為，國會從未授予政府，即使含蓄性的，在安南建立保護國的權利。這純出於政府的創意與行動，因此政府不但未履行它的承諾，甚且違反憲法。此外，政府又輕易放過

① 1883年7月10日，眾議院辯論記錄。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與中國政府和解的大好機會，正因如此，它才拒斥寶海所訂的條約，而稍後又試圖在相似的基礎上重啟談判之門。這位極左派的領袖更指控外長，以偽裝一個與中國真正交戰的狀態來欺騙國會。這位滔滔雄辯的政治家，最後在論及政府的交涉時，這樣說：「真正的情形是，你們不知彼，對敵人的武力消息不靈通，你們以為應該態度強硬，語氣高亢，一切談判應該擱置！事實上，當你們還有交涉餘地時，你們卻視而不見，你們交涉無方，談判不力！」⁵⁵

這次的質詢予內閣總理茹費理一次解釋其殖民政策的機會。翌日，費理對自己的立場作了很長的答辯，茲擇要敘述如下：

「我們不是和中國交戰中，我一點也不認為，我們是處於類似情形的前夕。理由很簡單，我相信中國不致和我們開戰；而我們也無意向她宣戰。……有人會問：『那你們想怎麼辦？』諸位先生，我們只不過向國會要求准許我們去做，除此再沒有別的！我們想牢固地立足於三角洲，攻佔山西（Sontay）與北寧（Bac-Ninh）兩處要塞，這是我們唯一所缺的。我可以向你們保證，一旦我們在那兒，沒有人可以把我們趕走，我們在那兒將是難以攻破的！

在我們四週有人會這樣說：不應該採取這種方式的行動，倒不如乾脆派遣二到三萬人到那兒，必要時對中國說：『你得承認我們在北圻的權利，否則我們對你宣戰！』諸位先生，我們不採取這種政策，我們是屬於忍耐與冷靜派。我們深信，以我們向國會所請求的兵力，假以時間，我們必可以牢固地立足於紅河三角洲。……

因此，各位知道，當我們從事一件殖民事業時，此地沒有人提議放棄；我們以耐性和冷靜武裝自己；我們以最大的謹慎來做這件偉大的事情，隨著時間的消逝，成功將更為可期。就某種方面來說，我們是為未來的世代，為我們的子子孫孫而工作，我們是會計師，做的是家庭好父親放款生息的工作！」⁵⁶

一八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由於查外長以健康理由請辭，茹費理乃自掌外部職務。在十月質詢過後，內閣復提出九百萬法郎額外款項的請求以供北圻軍費之用。為此內閣與國會又重開北圻問題的辯論。

十二月七日議會辯論開始，為期三天，首先發難的是李偉葉（Armand Riviere），他認為一八七四年的條約不構成對安南的保護權；中國自十年來即已明白表示，他

⁵⁵ 1883年10月31日，眾議院辯論記錄。

⁵⁶ 同上。

不會忘懷北圻，而我們不考慮她的警告是錯誤的。法國政府既不知道如何引導事件的發展，亦沒有坦誠向全國招認此事所挑起的危險⁵⁷。

夏姆 (Francis Charmes) 特別責難政府，拒斥了寶海草約。他說：「我一再指出，如果我們回溯到北圻問題的起源，則寶海的條約與我們的利益，甚至傳統是相符合的；再者，此約構成一種義務，對於中國政府而言，具有難以抗辯的嚴重性。然而，卻有人撕毀這個條約！這是法國政府，這是我們的外長說出他應該負責的話：『條約是可憎的，我們不能接受它』」。

為求亡羊補牢，夏姆最後結論說：

「因此，我要求政府，在向我們澄清它所運用的軍事方法，它所希望運用的外交手段之餘，能夠明確有所主張。也就是說，當它要作戰時，就要以足夠的方法來作戰；當它談判時，就應該擁有各種外交方式，而且它的條件不致於不被接受，這一點是過去所沒有充分做到的！」⁵⁸

德拉霍斯以皇黨 (Parti Bonapartiste) 代言人身份，拒絕對請款投票贊成，因為他認為，對請款投票，就等於對內閣投信任票。根據他的看法，殖民擴張政策註定讓法國走向無止境的冒險。北圻對於法國的用處一向不很大，而由於政府的輕舉妄動，把法國導向與中國的一場潛伏性或公開化的戰爭。最後，他加重語氣反問道：

「你們認為，從事這樣一種冒險的時間是正確的選擇嗎？我們在歐陸的情勢足可讓你們高枕無憂嗎？難道今日我們所處的孤立狀態（這種孤立狀態也是你們部長們所承認的），不夠讓你們反覆三思嗎？那整天叫囂反對我們的盟國，不是一再勸告我們要謹慎與多所瞻顧嗎？難道你們不知道，難道你們沒有感覺出來，險惡恐怖的傳聞目前已遍佈世界嗎？難道你們沒有察覺到，戰爭到處醞釀著，而最令人擔心的是歐洲的激盪，只要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就可以把我們必然的捲進去？此時此刻，正是所有人民，所有政府集中全力，默默準備以應付未來的打擊，面對即將來臨的禍害，而你們卻選擇此時此刻，徒耗我們的國力，從事無謂的遠征冒險！」⁵⁹

激烈反對派的要角貝勒丹 (Camille Pelletan)，與德拉霍斯同樣，反對一切的殖民擴張政策。他認為，殖民政策只是一種冒險政策，不過是一種遠征政策，應該受到鳴鼓而攻，而且停止進行。他這樣說：「我們所面對的政策，不是殖民政策，

⁵⁷ 1883年12月7日，衆議院辯論記錄。

⁵⁸ 同上。

⁵⁹ 同上。

而是遠征政策。……遠征政策通常是一種導致軍事解體，陷各方面於危險的政策。其所以危險，乃是它帶給民心士氣一種不真實的興奮與無謂的激動；其所以危險，乃因為每當法國被牽引到遙遠的地方行動，她就在歐洲缺席；而第二帝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像法國這樣一個國家，是否可以在歐洲缺席而不遭惡果。是的，軍事遠征與民主精神相違背，而我所不瞭解的，這竟是共和黨人所倡議和支持的！」⁶⁰

安德利奧 (Andrieux) 的論調大致與極左派和右派相彷彿。他在議壇上宣稱，政府沒有徵得國會的同意，而從事這項遠征，並可能挑起對外戰爭，這是有罪的。在投票贊成撥款之前，他籲請大家注意，嚴防類似的權力濫用再度重演，不使議會政治淪為個人權力的擋箭牌！

輪到李波 (Ribot) 發言時，他不厭其詳的列舉內閣的所有過失。首先他指責內閣玩弄議會，沒有適時提供必要的資料；其次，他指斥政府否定寶海條約，然後卻又回到這位外交官的原來安排上；最後，他指出政府的行動，狂妄自大，執迷不悟。

聽完李波的譴責，克雷孟梭打蛇隨棍上，緊跟著表示，如果內閣真正犯了李波先生所指的嚴重錯失，則議會應該把它推翻。克雷孟梭臨下議壇前，再三強調，今日本案的投票，即是意味與中國的開戰。

最後，茹費理以內閣總理兼外長的身份答覆說，就北圻事件而言，他所追求的不過是一種殖民保存的政策。事實上，北圻保護權與遠征乃是征服交趾支那的必然結果，正如突尼斯的保護權乃是征服阿爾及利亞的必然結果。自一八七四年以來，歷任內閣的安南政策並無更異。他從來沒有把中國視為「一個可以忽視的份量」(une quantité négligeable)。相反地，他在與中國的談判過程中，曾一再表示和解的意願，且不斷尋求一個可以轉圜的餘地。

在軍事行動方面，費理也指出它的界限與意圖。他說：

「這是一種有限制的局部性行動，而不牽涉別的。我們要在三角洲強而有力的挺立，我們要在那兒擁有幾個戰略據點，何以故？因為當我們強大時，我們才有談判的後盾；因為要和中國帝國政府談判，似乎該向她顯示法國並不決定在她面前不斷的退縮。我們認為，此種性質的示威，乃是此後一切嚴肅談判的必要前提，我們並且深信，談判的恢復可能就是這種示威的立刻效果。

我為那些談判者，向你們要求投票贊成撥款；因為別人只與強者勇者訂

⁶⁰ 1883年12月8日，衆議院辯論記錄。

約。而讓別人知曉法國既強且勇，屆時才會聽話於她！」^{⑥①}

在茹費理的有力呼籲下，眾議院先以三百七十三票對一百三十九票通過九百萬法郎的撥款案，參議院繼以三百零八票對二百零一票贊成本案，支持「政府運用一切必要的力量，以衛護法國在北圻的榮耀與利益」^{⑥②}。

撥款案雖然終於獲得通過，但由反對票數與贊成票數的相當接近，可以看出，法國殖民政策在國會中並不受歡迎，尤其議會中一股反對遠征的力量與日漸增。因為這種既耗巨財又損傷人命的勞師遠征，不但其結局令人難以逆料，甚且徒增議會與一般輿論的緊張氣氛。當有名的諒山事件^{⑥③}發生後，茹費理就在這種四面楚歌的情形下，於一八八五年三月三十日被迫下臺，就是一個極明顯的例證。

六、結 語

史家有謂，十九世紀是帝國主義向外殖民擴張的世紀。像一陣狂風，像一股浪潮，西方重要國家若英法，若意比，莫不爭先恐後將視線投注到地球上沒有主的土地，或雖已有主而尚待開發的國家，而進行那佔領據點，榨取原料，開拓市場，劃分勢力範圍的殖民活動，可以殖民成爲這個時期歐洲政治的主題，外交的重心。

一般研究法國殖民動機的學者，特別是美國和日本的學者，大都認爲法國所追求者，主要是法蘭西的光榮和偉大，經濟的利益尚在其次。例如凱第(John F. Cady)說：「法國在遠東殖民的根源，澈頭澈尾都是民族的驕傲，一種光芒四被的文化傳播力的驕傲」^{⑥④}。美國的易勞逸(Lloyd Eastman)^{⑥⑤}與日本的坂野正高(Masataka Banno)^{⑥⑥}均支持此一看法。政治虛榮心(包含文化傳播)多於經濟的利益，不像英國以商務推動政治，這是法國對外殖民與英國不同之根本所在。當然，法國若干史家則持不同的看法，例如瓦雷特(Jacques Valette)以里昂的蠶桑業爲例，

⑥① 1883年12月10日，眾議院辯論記錄。

⑥② 同上。

⑥③ 諒山事件，一稱北黎事件。乃由於李福草約所引起之一場軍事衝突。法方聲稱據約派兵八百人前往諒山接防，然中國駐防官兵並未接到撤兵命令，雙方乃發生衝突。結果法軍死將校二人卒十七人，傷將校三人，卒七十七人，消息傳至巴黎，頗引起震動。參閱邵循正，中法越南關係始末(文海出版社影印本)頁132-3

⑥④ John F. Cady, *The Roots of French Imperialism in Eastern Asia*. (Cornell Uni. Press, 1954.) p. 294.

⑥⑤ Lloyd Eastman, *Throne and Mandarins,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cy during the Sino-French Controversy, 1880-85*, Harvard Uni. Press Cambridge, 1967.

⑥⑥ Masataka Banno, *China and the West, 1858-1861, 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yamen* Harvard Uni press, Cambridge, 1964.

證明法國的殖民也含有商業利益在內⁶⁷。不管如何，個人以為，法國在遠東的殖民，主要以英國為競爭對象，正如安鄴（Francis Garnier）的夢想一般，想師英國在印度之故智，也在安南為法國建立一個東方帝國⁶⁸，雖然其中多少含有若干的商務利益在內，但其根本原動力主要仍是政治的。

十九世紀雖是一個殖民擴張的極盛時代，但在法國第三共和初期（1870-79），對內共和基礎不穩，黨爭頻仍，內閣不安於位，險象環生，對外強敵威脅仍在，危機重重，故是一個遇事觀望，難有作為的時代。到了一八八〇年左右，法國經過十年的休養生息，創傷大致已癒，國力漸告恢復，加上在外交上，德國俾斯麥於此時明白表示，他對北圻沒有任何領土的野心，而且「欣然同意」法國在安南的擴張，使法國沒有後顧之憂。因此，法國政策一變，由過去的保守退卻一變而為積極進取。

茹費理固然有「近代法國殖民擴張使徒」之稱，在他兩次組閣期間，他的政策也較前任為積極，但內有議會與輿論的掣肘和責難，外須顧慮國際（英國）干涉，使他無論對北圻問題的處理或對中國態度上，不得不特別謹慎從事，有時甚至呈現猶豫不決，似乎在政策與行動之間，未能渾然一體，也無法做到完全一致。法國史家哈第（Georges Hardy）認為，這種情形，主要因為共和黨人執政不久，有如學徒必須經過一段學習過程，故難免遇事摸索，並偶有猶豫不決，遲疑不進的情形⁶⁹。

⁶⁷ Jacques Valette, *L'expédition de Francis Garnier au Tonkin*, *Ruvue 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Avril-Juin, 1969.

⁶⁸ 拙文，安鄴與中國，「思與言」雙月刊，八卷六期，頁 303.

⁶⁹ George Hardy, *La Politique Coloniale et Le Partage de La Terre aux XIX^e et XX^e Siecles* (Paris, A. de Michel, 1937), p. 229.